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忧患人生与潇洒人生
——中国古代南北方民歌之比较

曾大兴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以中国南北文化为背景,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南北民歌的基本内涵。北方民歌所具有的"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爱情与婚姻的悖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表明它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而南方民歌所具有"快乐第一,责任第二的观念"、"爱情第一,婚姻第二的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潇洒人生"的歌。

关键词:古代民歌;南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1-0088-09

历史上的汉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的人民,长期被绑缚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之上,又深受封建礼教的牢笼,其忧患更为深重。比较而言,长江流域一带的人民,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生产力水平后来居上,加之远离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仅物质上比较宽裕,精神上也要自由许多。这些差异,在古代南北两地的民歌当中有很充分、很生动的表现。民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回响,它的真实性是别的文学样式尤其是所谓"雅文学"难以比拟的。无论是以民歌为视点来考察古代的南北文化,还是以南北文化为背景来解读古代的民歌,都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这样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识,还可以提升我们对"俗文学"的认同感。本文即是以南北文化为背景,来考察中国古代民歌的一个尝试。所讨论的民歌,主要是《诗经》中的"十三国风"与"二南"、南北朝民歌以及明清两代的"时歌小调",也有少量的唐代民歌。

一、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也是较集中的北方民歌,是《诗经》中的"十三国风",这是来自于黄河流域的周代民歌。135首歌中,表达人生忧患的字眼如忧、伤、艰、劳、悲、叹、哀、嗟、忉、怛、泣、忡、惕等等,竟出现了63次!可见那个年代的北方汉族民歌,在很大程度上讲,其实就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

北方汉民歌所赖以生长的土壤,是北方汉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表现出对英雄事业的热望,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故土的依恋。当年班超曾作投笔之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可以说是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可是当他到了西域,立了功,封了侯,圆了英雄的梦之后,他又悲不自胜地怀念故土了:"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超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前者可谓"英雄情结",后者可谓"故土情结"。这两个情结是一对矛盾。就一般情形而言,当英雄情结处于心理上的优势地位时,故土情结便受

收稿日期:2006-11-23

作者简介:曾大兴(1957-),男,湖北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到抑制；反过来，当故土情结处于优势地位时，英雄情结便受到抑制。值得注意的是，抑制总是暂时的、相对的。当英雄情结开始缓解而又没有完全缓解，故土情结受到抑制而又没有完全抑制时，冲突便不可避免了。我们所讲的北方汉文化的人生忧患，首先就表现为这两种情结的冲突与纠缠。请看《邶风》中的《击鼓》这首民歌：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歌曲的主人公在跟随主帅平定了陈、宋两个国家，为自己的祖国立下汗马功劳，英雄的梦想得到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之后，他的故土情结便开始复活了。他想起了对妻子的誓言，想起了家，但是主帅“不我以归”。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最后的结果，是复活了的故土情结受到抑制，——除了“于嗟”，他别无选择。

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为臣尽忠”与“为子尽孝”之间的矛盾。请看《唐风》中的《鸨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王事（徭役、兵役）总是没完没了，一年又一年地误了耕稼。更重要的是父母年迈，没人照料，也没有吃的。忠臣也许还没做成，首先倒做了不孝之子。不孝，对于一个想尽孝而实际上又难以尽孝的人来讲，可说是莫大的悲哀。《吕氏春秋·孝行》引《商书》云：“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那么怎样才算孝呢？该书援引曾子的话说：“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谓其近于弟也。”这里对于孝的阐述近于完备，可惜里边包含着悖论。因为“近于君”，便不大可能“近于亲”；为臣尽忠，便难以做到为子尽孝。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封建礼教又视孝为做人的根本，这就大大地加剧了为臣为子者的内心痛苦。不当差，不服役，不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不往英雄的梦境上靠，则为不忠；而当差服役，忠于王事，又得远离故土，有违农时，以至“仰不足以事父母”，从而陷入不孝之境。面对如此两难之境，这些可怜的人也就只有愧对双亲而呼天抢地了。

二、爱情与婚姻的悖离

英雄情结和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主要伤及男性，连带地伤及女性；爱情与婚姻之间的悖离，则主要伤及女性，连带地伤及男性。

汉族人的爱情是以夫妻伦理关系的建立为起点和归宿的。同别的民族相比，汉族人的爱情意识一样强烈；但是汉族人非常注重爱情的伦理意义，这一点却为别的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所不及。如果爱情能以婚姻的缔结为归宿，那便是人生的惬意之事。遗憾的是，由于伦理因素的过多介入，反而导致爱情和婚姻之间的经常性的悖离。

婚姻当事人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听从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这是导致爱情与婚姻悖离

的根本原因。请看《豳风》中的《伐柯》这首民歌: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覯之子,笾豆有践。

闻一多《风诗类抄》云:"女人为人求女者为之媒,使媒求妇,犹执斧伐柯,皆以类求类也。"婚姻的缔结不能没有媒人的介绍,但是媒人并不是作为婚姻当事人之间的中介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父母之间的中介而出现的,不同于现在的婚姻中介。媒人既是婚姻当事人的父母之间的中介,其职能自然不在说合青年男女,而在于说合青年男女的父母。也就是说,为了缔结一桩婚姻,仅仅有"媒妁之言"还不够,还必须有"父母之命"。《齐风》中的《南山》这首歌唱到:

𦈡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这样,青年男女在由爱情走向婚姻的过程中,就有两座大山横亘在前:一是"媒妁之言",一是"父母之命"。这两座大山只能翻越,不能绕过,否则就会受到谴责。《孟子·滕文公》云:"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是战国时人,实际上,早在他这篇高论发表之前,"国人"就已经这么做了。请看《蝃蝀》这首民歌的两个片断: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这个女子为什么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是因为她不顾"父母之命"而嫁给了一个自己心爱的人,并且还嫁得那么远!这是一种目无尊长的行为,所以舆论不肯放过她。舆论认为,一定是她已经和那个男人做下了丑事,所以才不顾一切地一走了之。"蝃蝀"是天上的彩虹,古代北方汉族把虹认作是天上某种动物之间的交媾。这首歌即是以虹为淫婚之象,比喻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私通。所谓舆论,就是以封建礼教为价值标准的周围一些人的议论。在北方,尤其是在北方的农村,女人是靠周围的舆论评价而生活行事的。众口铄金,人言可畏。所以宁可委屈了自己,也要先让舆论通得过。好在这个女孩子已经远嫁,不然的话,舆论不把她嚼烂才怪呢!谓予不信,请看《郑风》里的这首《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祈求自己的男友不要翻越她家的院子来找她?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可能会弄断树枝。一旦弄断树枝,就给人家留下了把柄:树枝是怎么弄断的?是不是有人"逾墙相从"?这样的话,她就有可能洗刷不清。父母兄弟就会来训斥她,左邻右舍更会飞短流长。为了避免人家的羞辱和中伤,她拒绝了自己心爱的人。在爱情和舆论之间,她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这便是舆论的力量。

青年男女的爱情只有得到父母的认可,才有可能结成婚姻。如果遭到父母的反对,则再美好的爱情也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如果媒人提到某门婚事,只要父母首肯,青年男女即便不同意,也得安心顺从。这种全然不顾及当事人的内心要求的婚姻,只能结下一枚又一枚苦涩的果子。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邶风·新台》)

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不想得到的又命定似地推都推不掉。这便是颠倒错乱的、忧患的人生。

女人在婚前没有自己的选择，婚后更不允许有自己一方提出的离异，除非是男人不要你。可是，真正等到男人不要你时再走人，那结局可就悲惨至极了。《诗经》“十三国风”里就有许多弃妇的歌，我们这里只看看《卫风·氓》里的一个片断：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这是一个贤德、勤俭、能干的女人。由于她的辛勤劳动和有效管理，家庭状况才得到改善。然而，她还是被遗弃了。根据她的诉说和作品的情感倾向来看，她的被遗弃，肯定不属于品行有亏，很有可能是由于年老色衰。她的丈夫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角色。可悲的是，她的被遗弃，不仅得不到一般人的同情，甚至连她的娘家兄弟都不理解，还以为她在婆家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呢。在那个时代，女人只有死了丈夫，而自己又无子嗣的情况下，才有理由投奔自己的娘家。如果遭人遗弃而回娘家，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娘家人而言，都是一件不体面的事。一个女人到了这个份上，可以说是忧患之至。

为了避免这种被遗弃的命运，绝大多数的妇女都只好屏声敛息地孝敬公婆，小心谨慎地侍奉丈夫，温良恭俭，夙兴夜寐，尽量地让别人高兴，哪怕是委屈了自己。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北方汉民歌所抨击的一个重点，尽管这种抨击还远不是一种理性的自觉。

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

如果说，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爱情与婚姻之间的悖离，构成了忧患人生的精神层面，那么，衣食住方面的绝对贫困，便构成了忧患人生的物质层面。古圣人云：“食色，性也。”吃饱肚子和繁殖后代，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需要。以务实著称的北方汉族人民，世世代代都在为这两种最基本的需要而含辛茹苦。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几千年来，多数人只是繁殖了后代，但是很少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多数人只是周而复始地辛勤耕耘，但是很少真正解决温饱问题。请看《豳风·七月》这首民歌的几个片断：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北风呼啸，寒冷刺骨，但是没有衣服过冬；房屋破败，老鼠穿堂，但是不能重新垒造；自春徂冬，播种收割，但是只有瓜菜糊口。

好在北方的农民素能吃苦。衣食住再糟，也能穷对付。只要不发生水旱蝗灾，不发生战乱和瘟疫，他们也能生存，也能繁殖。问题是这种绝对贫困带给他们的心理压抑，却是无法解除的。因为受冻挨饿的并不止家长一人，而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仰不足以事父母”则为不孝，“俯不足以蓄妻子”则为不慈。不孝不慈，还算什么男子汉？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实际上比生理上的挨饿受冻还要剧烈。请看下面几首歌曲的片断：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晔晔黄鸟，载其好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邶风·凯风》）

荟兮蔚兮，南山朝阳。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曹风·候人》）

两支歌都出自男子之口，从逻辑上讲，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男子的歌吟来理解。一方面，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他们兄弟七人，现在老了，他们却无以为报。另一方面，小女儿正长身体，本该

像山顶上的白云一样生动活泼,可事实上呢,却因为贫穷而在挨饿。对于一个主家的男人来讲,这该是多么彻底的无能,多么严重的失职啊!

也许是实在难以承受这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有人甚至幻想,要是没有家庭,该有多好!《桧风·隰有苌楚》就这样唱道: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古语云:"比拟必于其伦。"作为一个人,居然羡慕起桃树的无室无家无牵无挂,可见他已经被家庭问题拖垮了。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男男女女活得这样沉重,这样痛苦?物质上的贫困自然不能回避,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忠孝观念的牢笼。为了尽忠,必须尽力于王事;而尽力于王事,又不能尽孝于父母。忠孝不能两全,让他们陷于两难之境。为了尽孝,必须结婚成家;而结婚成家,又不能由自己做主。爱情和婚姻的悖离,使他们饱受精神上的煎熬。成家之后,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他们不仅要忍饥挨冻,还会因"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上不能"贵老",下不能"慈幼"而深深地愧疚,深深地自责。忠和孝,成了一条无所不在的链条,牢牢地套住了他们整个的人生。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忠孝观念如此地深入骨髓呢?说到底,还是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既是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腹心,又是忠孝观念浸染最深的地区。在国尽忠,在家尽孝,既是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又是人们获取社会荣誉、赢得社会地位的正途。这里面虽不排除某些情感因素,如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亲情,但是,为追求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深深地制约着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尽管到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既无社会地位,也无社会荣誉,仅仅是做了忠孝观念的牺牲品!这就是北方汉族民歌所赖以生存和流行的土壤。

四、快乐第一、责任第二的观念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南方文化也有自己的忧患。不过,这种忧患不像北方汉文化那样既深且广。南方文化本身也有内在矛盾,也有内在冲突,但是这种矛盾主要不是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也主要不是尽忠与尽孝之间的冲突。因为南方文化所注重的主要不是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而是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南方文化既不是那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来自伦理方面的困惑与忧伤。

我们先来看一首南朝民歌《前溪歌》:

黄葛生烂熳,谁知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

主人公同"娇儿"的关系属于亲情关系,同"郎"的关系则属于爱情关系。为了报答"郎"的"殷勤",宁可断了"娇儿"的乳汁;为了爱情的快乐,宁可不顾母亲的责任。这就表明,在南方民歌的价值观念里,快乐是第一性的,责任是第二性的。对晚辈如此,对长辈也是这样。请看明代的一支南方时调小曲《是非》:

我俩人好事只在朝和暮,被冤家谤坏了,顿起风波。

从来的破姻缘天灾神祸,挑得我东一个西一个,就是杀父仇没这样毒。

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还要背地里笑着我。

从封建礼教的角度来看,这支歌曲是有些离经叛道的。《礼记·曲礼》云:"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引《沈子》云:"君弒,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封建礼教

认为，天壤间只有君父之仇才是最大的仇，一段姻缘被拆散算得了什么？但是歌曲的主人公却认为，拆散一段姻缘的仇恨要大于杀父之仇。也就是说，好姻缘带来的快乐是第一性的，报杀父之仇的责任则是第二性的。

父亲和母亲，乃是故土这个概念的具象化。既然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都是次要的，于是，北方民歌里所在即是的故土情结，在南方歌曲里便不复存在了。请看唐代的一首南方歌曲《长相思》：

估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终日红楼上，□□舞著词。

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尽日贪欢逐乐，此是富不归。

在外边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快乐；只要有快乐，就可以不回家。至于家乡的父母妻儿生活得怎样，是不是天天都在牵挂他，他是一点也不在意的。对比一下北方歌曲《陟岵》中的那位服役在外的男子，一步三回头地唱着“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简直要为这个南方商人的无牵无挂而惊叹了！

南方民歌对于故土的责任是淡漠的，对于北方文化所热衷的功名事业、英雄前程、社会成就等等足以体现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东西更是淡漠的。其所注重的不是外在事功，而是个体的生命体验：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子夜歌》之十六）

这里似乎有一种对于有限人生的忧虑，但所虑者并非时光易逝功名未立，而是欢乐苦短青春不再。请看下面这几首南朝时期的歌曲：

人生不满百，常抱千岁忧。早知人命促，秉烛夜行游。（《同生曲》之一）

白头不忍死，心愁皆敖然。游戏泰始世，一日当千年。（《来罗》之四）

饮酒须饮多，人生能几何？百年须受乐，莫厌管弦多。（《饮酒乐》）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休洗红》之一）

如果说，南方文化也有忧患的话，那么，这忧患不是基于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之间的冲突，也不是基于为臣尽忠与为子尽孝之间的悖离，而是基于丰富的人生与有限的人寿之间的矛盾。南方人对这一点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既然人寿有限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那就不必为此而徒事悲伤了。好好地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吧，把一天当作一年来过，把一年当作一千年来过，这不就延长了生命的有效时间，提高了生命的质量么？所以要及时行乐，要饮酒，要恋爱，要听音乐，要投向大自然的怀抱。不能，也没必要为了那蜗角功名，譬如做个英雄，做个忠孝两全的模范，而牺牲了自身的快乐。

五、爱情第一、婚姻第二的精神

南方文化由于注重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较少社会功利方面的考虑，较少封建礼教方面的羁绊，所以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比北方要自由得多，洒脱得多。诚然，在南方，也有“媒妁之言”的干预，也有“父母之命”的制约，也有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发生，但是总的来看，南方的爱情婚姻悲剧远没有北方那么惨烈。南方的青年男女不像北方的那样全然由“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摆布，不是那么驯服，不是那么听天由命。如果说，北方是锁链之下的呻吟，那么南方便是戴着锁链的舞蹈。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诗经》“二南”中一首叫做《野有死麕》的两个片断，这是长江流域的歌。这里的主人公同《将仲子》里的主人公就不一样，虽说多少还有点矜持，但毕竟勇敢地走出了家门，同自己的恋人

在树林里幽会,不似后者那样怕父母,怕兄长,怕别人飞短流长,从而把自己的恋人拒之于院外。同是恋爱,《野有死麕》里的男女青年要开心得多,幸福得多,而《将仲子》里的男女青年则要压抑得多,痛苦得多。

南方的青年男女不仅有勇气背着家人出去相会,许多人甚至一无顾忌地有了婚前性行为。

请看下面这首南朝民歌《子夜歌》:

前丝成缠绵,意欲结交情。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

"丝""私"谐音,"丝子"即"私子"。"私子"是"结交情"的产物,是婚前性行为的产物。如果说,这个时候的歌唱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羞怯含蓄,还要用点谐音来遮掩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便整个地"掀起盖头",放言无忌了。请看《挂枝儿·愁孕》:

悔当初与他偷了一下,谁知道就有了小冤家,主腰儿束来肚子大。

这等不尴不尬事,如何处置它?

免不得娘知也,定有一顿打。

怀了孕而怕娘打,可知是婚前性行为。再看几支同类歌曲:

爹娘叫我乘凉坐了一黄昏,只见情郎走来面前来引一引。

姐儿慌忙假充萤火虫说道爷来里娘来里,咦怕情哥郎去了喝道风婆婆且在草里登。(《挂枝儿·引》)

阿娘管我虎一般,我把娘来鼓里瞒。

正是巡检司前失了贼,枉了弓兵晓夜看。(《挂枝儿·瞒娘》)

娘又乖,姐又乖,吃娘捉个石灰满房筛。

小阿奴奴拼得驮郎上床驮下地,两人合着一双鞋。(《挂枝儿·乖》)

防范的对象是爹娘而不是丈夫和公婆,说明这种偷情行为是在娘家发生的;既发生在娘家,就说明这是一种婚前性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不是全无顾忌的,要防范爹娘。但是他们的最后成功,又说明这种防范并不严密。做爹娘的,或许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一支民歌就这样唱道: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个看星星,阿娘就说道结私情。

便是肚里个蛔虫无介得知得快,想阿娘也是过来人。(《山歌·看星》)

诚然,即便是在这种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南方也结下了许多不如意的婚姻,因为"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并没有解除。不过这种不如意的婚姻并不像北方那样惨苦。南方的青年男女并不像北方的那样循规蹈矩听天由命,他们会积极而巧妙地寻求婚外的补偿:

俏娘儿指定了杜康骂,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

进门来一跤儿跌倒在奴怀下。

那管人瞧见,幸遇我丈夫不在家。

好色贪杯的冤家也,把性命儿当做耍。(《挂枝儿·骂杜康》)

急水滩头下断簾,又张蟹了又张鳗。

有福个情哥弗知吃了阿奴个多少团脐蟹,我个亲夫弗知吃了小阿奴奴多少鳗。(《山歌·瞒夫》)

郎爱子姐哩姐咦爱子郎,偷情弗敢明当当。

姐有亲夫郎有眷,何弗做场交易两成双?(《山歌·交易》)

在这些歌曲里,防范的对象已经不是爹娘,而是亲夫和老婆了。这就表明,这种偷情已经不是婚前性行为,而是婚外恋。这种婚外恋无论怎样设防,总有露马脚的时候。不过这些人似乎并不

怎么在乎：

丢落子私情咦弗通，弗丢落个私情介怕老公。

宁可拔来老公打子顿，那舍得从小私情一旦空？（《山歌·怕老公》）

宁可让老公打一顿，也不放弃从小就结下的私情。婚姻没有为她带来幸福，但她并不因此而期期艾艾幽怨感伤，而是把这婚姻看得淡而又淡。有“私情”就有幸福，何必被这不幸的婚姻所牢笼呢？爱情是第一性的，婚姻是第二性的。如果好端端的一对情侣被拆散了，也不必呼天抢地要死要活。头天晚上嫁过去，第二天晚上便可幽会情人：

姐儿昨夜嫁得来，情哥郎性急就忒在门前来。

姐道郎呀，两对手打拳你且看头势，没要大熟牵砻做出来。（《山歌·新嫁》）

前脚踏进夫家的门，后脚便跟进来一个昔日的情人。这种情形，比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小说中的主人公还要浪漫三分。试问这里还有什么礼教可言？而且，同一个刚出嫁的女人热乎着，会有一个明确的归宿么？其实，当事人的心里明白得很：管它什么礼教不礼教呢，管它什么归宿不归宿呢，只要有爱情，有幸福，有快乐就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违背封建礼教，反抗不合理婚姻的叛逆行为，在南方的男女们做来，并不显得怎样地悲壮激越，怎样地惊天动地，就像“五四”时期的那些写爱情的小说和戏剧那样，要死要活的。相反，他们都做得很机智，很轻松，很自在：

嫁出囡儿哭出子个浜，掉子村中恍后生。三朝满月我搭你重相会，假充娘舅望外甥。（《山歌·嫁》）

送郎出去并肩行，娘房前灯火亮瞪瞪。解开袄子遮郎过，两人并做子一人行。（《山歌·送郎》之一）

搭识子私情雪里来，屋边头个脚迹有人猜。三个铜钱买双草鞋我里情哥郎颠倒着，只猜去子弗猜来。（《山歌·瞒人》之四）

结识私情要放乖，弗要眉来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见同还礼，狭路上个相逢两闪开。（《山歌·瞒人》之一

人人说我与你有私情，寻场相骂洗身清。你便拔出子拳头只说打，我便手指吴山骂洞庭。（《山歌·瞒人》之二）

他们能够在父母、公婆、丈夫、妻子以及旁人的监视与防范之下，做得那么乖巧，那么聪明，哪里像是“作奸犯科”？简直就是智力游戏。当然，这种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而一旦出了纰漏，他们则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决不害怕，决不做缩头乌龟，更不寻死觅活：

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

咬钉嚼铁我偷郎！（《山歌·偷》）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剐、凌迟，

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来一遭！（《吴歌·甘认》）

碎剐也好，凌迟也好，不就是一个死么？为情而死，总比死于无情要值。参透了得失荣辱生死祸福，人生也就潇洒自在了。这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功名意识强烈的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份勇气的。

民歌的土壤在民俗，民俗是底层人民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南方民歌对北方文化所关注的功名事业、忠君孝亲等等那样漠视，而对北方文化所漠视的个体生命、个人情感等等又那样关注，应该说，也是有它充分的民俗依据的。早在《隋书·

地理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长江上游的梁州,“人多工巧”,“然多溺于逸乐”,“家贫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而“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长江下游的扬州,则“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

这种风气到了北宋以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周淳《乾道临安志·风俗》载:

杭州人“善于图利”。“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

高斯得《耻堂存稿·谕俗文》亦云:

江浙一带的人为了钱财,“往往父子相残,兄弟相贼,夫妻相弃,亲戚相仇”。

“师儒之道”不尊,“仁义之术”沦丧,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与价值的基本尺度,官本位受到严峻挑战。北方文化所标举的英雄事业在这里既失去了眩目的光彩,北方人的英雄情结在这里也就无从谈起。既然父子可以相残,兄弟可以相贼,夫妻可以相弃,亲戚可以相仇,那么,以父子、兄弟、夫妻和亲戚关系为核心的故土情结也就所存无几了。英雄情结、故土情结、忠孝观念都淡化了,北方文化所具有的那种深重的忧患也随之稀释。这就是南方民歌所赖以生存和流行的土壤。

参考文献:

[1] 朱 熹. 诗经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曾昭岷,等. 全唐五代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冯梦龙,等. 明清民歌明调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Careworn Life and Natural Lif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orth Folk Song and the South Folk Song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ZENG Da-x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arefully compared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between the north folk songs and the south folk songs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g. The north folk songs which have the confliction of the heroic complex and the native land complex and the disobey of the love and the marriage and the dual sufferings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mental, has the connotation of careworn life; The south songs which have the idea that the joy is firs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is second and the spirit that the love is first and the marital is second, has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al life.

Key Words: China; south and north; culture; folk song